

张正明

经商文化丛书

兴界图书出版公司

晋商与经营文化



”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些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饮冰室论文集》

经营文化丛书

晋商与经营文化

张正明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责任编辑:刘大可

封面设计:陈惠兴

经营文化丛书
晋商与经营文化

张正明 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定路 5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场南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75 字数:185 000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7-5062-3908-6/G·28

定价:13.20 元

105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经营文化丛书”之一。作者对晋商的经营文化作了较系统、全面、深入的阐述。全书共八章,分别介绍了晋商的历史地位、经营价值观、经营精神、经营术、经营作风、管理制度等,还介绍了晋商的会馆文化、家族文化,论述了晋商与戏曲、社火、古籍文物、饮食、武术、科技等社会文化的关系。全书资料翔实,分析精要,角度新颖,文笔流畅,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本书适宜于商业科研工作者、史学研究者、商业管理者阅读,也可供一般商业从业人员参考。

晋商是活跃于明清时期,也就是 14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的山西商人。他们前后称雄商界 5 个多世纪,这在世界商业史上也十分罕见,其影响深远。晋商之经营颇有独到之处,其经营文化尤为引人注目。

目 录

第一章	闻名世界的晋商	1
一	被“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1
二	天时、地利、人和	11
第二章	晋商的气质与塑造	19
一	经营价值观	19
二	经营精神	28
三	精神追求	33
第三章	晋商商术	41
一	独特的经营术	41
二	讲实际的经营作风	55
三	严格的管理制度	61
第四章	晋商会馆文化	70
一	晋商会馆的产生与发展	70
二	晋商会馆的功能	77
三	晋商会馆的性质与价值	84
第五章	晋商与政治	88
一	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88
二	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及财政.....	90
三	结托政府官吏	93
四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94
第六章	晋商家族文化	96
一	晋商家族文化的特征	96

二	晋商家族个例	111
第七章	商号与商人集粹	142
一	特色各异的商号文化	142
二	商人经营文化	157
第八章	晋商与社会文化	176
一	晋商与戏曲	176
二	晋商与社火	182
三	晋商与古籍文物	184
四	晋商与饮食	188
五	晋商与武术	192
六	晋商与科技	196
七	晋商与茶文化	198
第九章	结束语	202
	主要参考书目	209
	后 记	212

第一章 闻名世界的晋商

一 被“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1912年10月30日晚7时许,北京德昌饭店里,觥筹交错,座无虚席,大德玉等22家山西票号在此设宴欢迎海外归来的梁启超先生。酒过数巡,梁氏即席演讲道:“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饮冰室文集》)。梁氏所说之山西商业,即指明清时期,也就是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之山西商业。梁氏何以如此高度评价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业呢?原来明清晋商有如下不凡之处:

1. 资本最雄厚的商人。明朝嘉靖年间,声势显赫、家财万贯的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一次在家中与众宾客煮酒论“天下富家”,以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有17家被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据史家研究,明清晋商其资本从明前期积累,到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明人沈思孝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录》)。明人宋应星说:(在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野议·盐政议》)。明人林希元说:在南京的山西商人“挟资大者巨万,少者千百”(《林次崖先生文集》卷2)。明万历时曾任内阁大学士的蒲州人张四维之父张允龄“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其妻兄官居宣大总督的王崇古也是蒲州人,王氏家族所营“盐在河东”,与张允龄“相与控二方利”。由于山西商人富名在外,以致在南京发生了利用商人贪财心

理,诈骗山西商人钱财之案。据冯梦龙《智囊·杂智部》载:万历三十四年(1606),南京有山西商人开绒货店于三山街,有客偕一道士留定银一大錠购买绒货,自是以催货为名频频到店。后谎称店屋有秦始皇所藏千金,商人信之,约午后共掘之,俟深夜,发至五尺深,并无所见,天已大明,忽门外督府驾到,商人跪伏于地,督府曰:“闻秦皇埋金为足下所发,其富敌国,某特奉贺。方今边饷告匱,诚以数万佐国家之急,万户侯不足道也!某为足下奏闻”。商人叩称无有,而客与道士言:“埋金实有之,但不甚多”。商人不能白,惧祸,馈三千金求免,并还定货之银,由是绒业遂废。

入清以后,随着商业经营活动的扩大,晋商资本又有大幅度增加。据《清高宗实录》卷 1257 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惠亲王绵愉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著名的山西大盛魁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两万头,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 50 两重的元宝铺一条从库伦(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道路。咸丰时,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奏称:“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十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家资约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军机处录副》章嗣衡奏折)。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称:“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这位平阳亢氏,据近代学者邓之诚先生考证:“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骨董琐记全编》卷 3)。邓氏所讲的季氏,是江南季沧苇,为扬州两淮大盐商。亢氏与季氏一样是扬州大盐商。在扬州还有“南安北亢”之说,南安是指当时扬州的盐务总商,亢氏与安氏齐名,可见亢氏在扬州财势之雄厚。亢氏还拥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阳府

“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亢氏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据说，亢氏原在平阳府开设有一大典当铺，后来有人在亢氏当铺附近也开设了一家当铺。亢氏眼见他人与自己竞争很不甘心，决心挤垮这家当铺。于是，每天派人到这家当铺中典当一个金罗汉，典价银 1000 两，连续典当了三个月，这家当铺的主人着了慌，忙问典当人何以能有这么多的金罗汉要典当。来人答道：“我家有金罗汉 500 尊，现只典当了 90 尊，尚有 410 尊金罗汉要拿来典当哩！”这家当铺的主人听了大吃一惊，急忙向来人施礼，询问来人的东家，才知是平阳府巨富亢氏。当铺主人自知不是亢氏的对手，只好托人与亢氏协商，请将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高飞了。此传说姑且不去考证其真假，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亢氏是个大富商。清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还对除亢氏以外，光绪时资产在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的山西富商予以列表排列。兹抄录如下：

姓	资产额	住 址
侯	七八百万两	介休县
曹	六七百万两	太谷县
乔	四五百万两	祁 县
渠	三四百万两	祁 县
常	百数十万两	榆次县
刘	百万两以上	太谷县
侯	八十万两	榆次县
武	五十万两	太谷县
王	五十万两	榆次县
孟	四十万两	太谷县
何	四十万两	榆次县
杨	三十万两	太谷县
冀	三十万两	介休县
郝	三十万两	榆次县

其实徐氏对山西富商极盛时资产的估计,并不完全。如祁县富商乔氏,极盛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 200 多处,加上流动资金及土地不动产,估计资产在千万两以上。祁县富商渠源祯曾在其住宅和三晋源票号窖藏大量银两,估计在百万两以上,后人一次就挖出窖藏银 30 万两。

大体说来,明代山西富商资产一般为数十万银两,清代则达数百万两到千万两以上,其资本之雄厚,堪称为最。

2. 经营行业多,足迹“遍天下”。明清晋商经营行业很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从其经营行业来看,大致有盐业、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药材业、纸张业、干鲜果业、饮食业、书业、鞋业、典当业、玉器古玩业、油业、铜业、洋货业、杂货业、帐局、票号业等。其活动范围,遍及华北、华中、江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成都、重庆、杭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沙、济南、上海等商埠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西北新疆古城、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南打箭炉、理塘、巴塘,东北宁古塔、墨尔根(今嫩江),东南台湾、海南岛等边陲海岛都有晋商足迹。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晋商的足迹。当然,此乃形容之语,但也可见其足迹之广。

明清晋商还积极开展国际贸易。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光绪《襄陵县志》卷 22)。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有晋商拟乘船私贩人参到日本。入清后,随着恰克图对俄贸易口岸的开辟,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对俄贸易中,主要是山西商人在经营。他们以中国之茶叶、丝织物等易俄之毛织物(如哔叽、绒货、毛毯等)。道光时,中俄恰克图国际贸易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道光二十年(1840)到三十年(1850),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60% 以上,而恰克图是主要贸易口岸;对俄贸易占中国输出总额的 16% ~ 19%,仅次于对英贸易,其贸易口岸主要是恰克图。恰克图

成为与南方广州遥相呼应的中国北方对外贸易口岸。山西商人还走出国界,“远贾安息”(今伊朗),并深入到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等地设号经营。清乾隆时,以山西介休范氏为代表的山西船帮在对外贸易中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洋铜商,时有洋铜船 15 艘,范氏就有六七艘。他们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销日本,同时把洋铜等日本商品贩回中国。由于晋商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的活动,从而扩大了国外市场。

3. 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清后期,晋商创立了东方独有的山西票号业,并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清后期产生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即:(1)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当时,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活跃。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贸易的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2)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漕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17 世纪后,清朝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两,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所发展。(3)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雍正时,我国北方已经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帐局,又称帐庄。帐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钱业的钱庄。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典当业从

清嘉、道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其中最典型的是典当铺。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当铺2万多家,其中山西人开办的就有4695家。清人李燧说:“典当铺江以南皆徽人开办,江以北皆晋人开办”(《晋游日记》)。由上可见,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类金融机构。(4)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标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也就是说,镖局是由武艺高强人保证安全运送现银的机构。但是嘉、道以来,由于社会动荡,土匪四起,镖局运现已不安全,而且费时,费用又高。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应运而生。但是票号何以由晋商首创呢?其原因有三:一是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二是晋商多从事长途贩运,资本用量大。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于是在帐局基础上产生票号。三是晋商商号遍布各商埠,为解决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需要,产生了汇兑形式的票号。山西票号产生的年代大体在道光初年,第一家票号是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此号原为西裕成颜料庄。嘉靖后期,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加之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很不安定。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在征得财东的同意后,将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票号。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济南、张家口、天津等地设立了分号。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到光绪九年(1883),山西票号已达30家,并按其总号所在地形成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其分庄遍布全国各工商业城镇,其营业范围主要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起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时称“汇兑天下”。咸丰以来,山西票号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

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户部外存放银共 693 万两,其中 30% 存放在山西票号。也就是说,山西票号掌握着清政府财政部门三分之一的款项,以致山西票号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4. 开创了中国人在海外开办银行的先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十日,日本神户市《神户新闻》、《又新日报》各自登出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广告——中国合盛元银行在神户开业。所谓合盛元银行,即山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开设之分号。合盛元票号总号设在山西祁县,其财东郭嵘、总经理贺洪如、分庄经理申树楷等都是颇有远见的商人。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为了发展汇兑业务,先在安东(丹东)设立分庄后,又在当时被俄国势力控制的朝鲜新义州设立代办所,开始了国际汇兑业务。光绪二十六年(1900),新义州代办所改为合盛元支庄。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次年,俄国战败,被迫放弃在朝鲜的特权,并与日本在东京召开会议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合盛元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先后在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等地设立分庄,并进而向日本本土发展。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说:“查我国何祇有通商银行一区,近来户部、信成二银行均甫开办,然调盈济虚,商界获益,已非浅鲜。惜仅推行于内埠,未能增设于外洋。况我国之在东西洋及南洋群岛从事工商业者实繁有徒,且近岁留学欧日之学生不下万人,因无本国银行,其存放汇兑无不仰人鼻息,困难杂出,遗恤漏卮”(《山西票号史料》)。合盛元票号要在日本设分庄,可谓有胆有识。但是,日本政府并不轻易允许外国人在其领土上设立银行,尤其对华商百般刁难。为此,合盛元数次派员赴日,多方奔走,在清政府驻日大使和旅日侨胞、留学生的帮助下,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三十日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神户支行。开业之际,合盛元在日本报纸登载了广告。半年后,合盛元票号又在日本东京、横滨、大阪及韩国仁川设分庄。是年合盛元在

《大公报》登载《合盛元创设日本东京、横滨、神户、大阪各处支庄告白》称：“启者，近来环球大通，商务争盛，而国家特设专部鼓励讲求，惟我商人亦须及时起发，以图扩充。乃观各国银行来吾邦开设者甚多，其晋之汇业一途亦与银行所司无异，然独不能出洋半步，良可慨也。有鉴于此，因特选派要人，提出重款，先至东洋各处创设支庄。”合盛元票号在日本从事国际汇兑，向外商提供金融信用，对侨胞特别是留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废除科举制，中国留日学生曾达到 8000 余人。合盛元票号从在日本开办支庄以来，一直承担着留日学生的学费汇兑业务。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仍保存着明治四十一年（1908）由合盛元票号汇兑中国留日学生学费的档案资料。合盛元票号不仅为留学生汇兑学杂费，还对海外侨胞给予汇兑等照顾和优待。应当指出，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渡重洋设立支庄，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5. 对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商业资本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对旧经济的解体和新经济的产生起着积极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而这个作用发展到被人觉察的程度，则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发展的后期。晋商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最大的一个地方商帮。因此，它在这个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首先，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晋商的经营活动，对于中国城镇的兴盛，特别是边陲城镇的兴起，起过特殊的作用。例如塞外包头城，原本无城，是山西祁县乔姓商人先在该地开设复盛公商号，后又增设复盛西、复盛全等商号，乾隆时逐渐形成城镇，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恰克图地处蒙古土谢图汗北境，色楞格河东岸中俄分界处，其地初为荒野，自雍正五年（1727）作为中俄互市之地，

晋商云集,市肆喧闹,商业茂盛。18世纪末,该城有商店100余家,其中较大商店37家。库伦(乌兰巴托),康熙年间有山西商人来此经商,到咸丰时,从东营子到西库伦,商号皆为晋商开办,使库伦成为外蒙古地方的商业重镇。乌里雅苏台蒙语为乌杨柳,本非集镇。清初随着清军势力向西推进,山西旅蒙商人随军而进,乌里雅苏台的商业也随之渐兴。科布多原本荒凉,晋商最早在此经商,乾隆时发展为“城有市场,商贾骈集”之城镇。多伦诺尔昔时仅七个水泡子,随着晋商往来频繁,商务渐盛。归化城(呼和浩特)是晋商集中地之一,著名的山西大盛魁商号总号就设在此,乾隆时归化城已发展为蒙古地区第一大商业城镇。张家口原是一片荒野,入清后始为南北交易之所,“贾多山右人”,乾隆时张家口已发展成为“塞上商埠”、“塞上皮都”。巴里坤由于“商贾毕集,晋民尤多”而成集镇。西宁城设号经营者多为晋商,著名的山西商号有晋益老,以致西宁城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东北的卜奎(齐齐哈尔),清代是蒙、汉、达斡尔族贸易的据点,这里“商贩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成为东北新兴城镇。朝阳县也是在晋商的推动下而兴起,故有“先有山西曹氏商号,后有朝阳县”之说。

晋商对于内地城镇的兴盛也有着推动作用。如九边之首的大同,原只是军事重镇,但由于山西商人在这一带经商,使大同“繁华富庶,不下江南”。晋南的运城,元代尚是一村落,元末始建城,是河东盐冶所在地,也是山西盐商的老窠。随着明清山西盐商的活跃,运城日渐繁荣,到清代前期已是“商民辐辏,烟火万家”,“晋省一都会”。平遥、太谷、祁县原只是晋中的一般县城,清代山西票号兴起,由于这三个县城是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因而三县城也成为当时著名的金融城市。平遥县城中“厘肆纵横,街衢皆黑垠,有类京师,盖人烟稠密之故”。太谷县“商贾辐辏,甲于晋阳”。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在他所著的《宋氏三姐妹》一书中称太谷为“中国的华尔街”。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南京、汉口等商埠,也是晋商集中

活动的地方,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晋商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次,对于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明清时期,曾有一些晋商将其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向生产领域,开始向早期资产者转化。如明代曾有位晋商先是贩运、收购松江棉布,后发展到自己投资开设工场,召募工匠,从事染色加工。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新疆古城北瑚图斯地方,有山西商人刘通聚集千余人在该地私开金厂。乾隆五十一年(1786),山西榆次商人郭君玺曾在顺天府与人合伙开煤窑。乾隆五十四年(1789),山西商人王延辉曾在延庆府属黄土梁地方开采铅。清末,山西蔚盛长票号曾在河南道口开印刷厂和南阳桑场发放贷款。不过上述投资,由于资料缺乏,情况不详,性质也不够明显。而晋商对山西近代工业的投资却比较明显,晋商确实对山西近代工业的产生作出了一定贡献。

山西最早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由富商渠本翘创办的。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当局开办火柴局,开创了山西近代官办工业的先河。光绪二十五年(1899),火柴局改由山西商务局接管,但营业不佳。光绪二十九年(1903),渠本翘以银 5000 两作价接管,渠又拉同乡乔雨亭入伙,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从此官办工业转为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山西第一次出现了私人近代工业企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商人、士绅组织了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集资 20 万股。从此,山西有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民营采煤近代企业。山西最早的电灯公司由山西襄汾县商人兼地主刘笃敬于宣统元年(1909)创办。山西商人还投资近代铁路建设。如山西同蒲铁路奏准商办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公推刘笃敬总理铁路建设事务,由山西票号商认股 60 万两,其他各商认股 40 万两。后来,山西同蒲铁路终于在 1933 年建成,成为山西南北交通一大动脉。